

评论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近日借媒体传达对国庆长假加班加点工作的工作人员的感谢。他风趣地说,他本来打算节假日期间去慰问一下的,后来想想还是取消了,一来是担心过去慰问了把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打乱了,二来也担心老百姓说这不又是在作秀嘛。(10月10日《南方都市报》)

领导干部忌惮“作秀”是个好兆头

张玉胜

节日期间坚守岗位,这份辛劳的确值得尊敬与感谢。但很多时候的领导“慰问”,不是重在体察坚守者的辛苦与诉求,而是意在彰显官员“联系群众”的“亲民”形象。君不见,慰问活动中一大帮媒体记者的随行,慰问后报纸、电视连篇累牍的报道。同时,一千领导在劳动者忙于工作时现场慰问,势必会影响一线工作秩序,增加基层的迎送负担。从这点说,深圳市领导取消假日慰问不失为理性与明智的选择。

忌惮“作秀”,需防止官员与社会两个层面的认知误区。一是官员不能惧于“作秀”而不作为。应该说,领导干部除了岗位职责,对社会都应负有率先垂范的引领义务。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言行不可避免的会有“作秀”成分,比如倡导廉洁勤政、关心弱势群体、带头遵纪守法、致力公益事业等等。他们的

“秀”应该是基于号召与承诺、榜样与示范。衡量是否“作秀”当主要看其行为是否言行一致和持之以恒。

二是舆论切勿动辄滥施“作秀”大棒。“作秀”论的泛滥已是不争事实。在一些人看来,官员的一举一动皆“作秀”,比如自行车接送子女、请农民工吃饭、车站负责人排队买票等等。且不说其是否有“作秀”本意,即使真“作秀”,如果人们给予的是掌声与鼓励而不是质疑与挑剔,“作秀”或许能衍生为常态化坚守。一概而论地滥施“作秀”大棒,势必会打压善举的萌动。

领导干部忌惮“作秀”无疑是个好兆头。传递和放大社会正能量,宽容和引导官员“作秀”,或许会有“良币驱逐劣币”的疏导功效。摒弃“作秀”,不妨就从领导干部忌惮“作秀”开始。

微评论

官员能否留须关键得看大众感受

舒锐

湖南祁东县前常务副县长、衡阳市卫生局党组书记邹爱民因留了八字胡,日前引来网友热议。有网友在论坛将其蓄有胡须的照片发帖,并称为“毛官”。有网友认为其违反公务员形象规定,另有网友则表示,“只要是清官就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10月10日《深圳晚报》)

纵观邹先生,他并没有留有怪异的胡须,并且更有很多公众为其鸣不平。这就说明至少这些公众并不认为邹先生的留须行为影响了“举止端庄,仪表整洁”。这就类似于法律没有规定公务人员不能戴眼镜,而如果某位公务人员佩戴了一副极其古怪以至于公众无法接受的眼镜,自然不大合适。反之,我们就不能对其是否戴眼镜、戴何种眼镜作出硬性要求。同理,邹先生留了一片并不怪异的胡须,其实并没有某些网友所指责的那么严重,甚至某些网友称其为“毛官”本身就可能涉嫌侮辱。

我们大可不必用留胡须来判断某个官员是否符合公务员形象。只要他有着服务群众的赤诚之心,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一位值得公众尊重的好官。否则,像前不久下台的陕西“表哥”杨达才那样,把胡须刮得再干净,也不符合人民公仆的应有形象。

请揭开“跨省毁报”事件的面纱

杨维兵

《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王克勤9日发布微博称,原本当日云南《都市时报》A30版要推出《福建“表叔厅长”来了》。几十万份报纸已经印刷,凌晨却被跨省销毁。(10月10日《深圳都市报》)

在媒体资讯异常发达的今天,偶尔能看到个别基层官员藐视舆论监督或者是舆论监督稿件胎死腹中的消息,但几十万份已印好的报纸被跨省销毁的新闻还是第一次看到。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工作,温家宝总理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曾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总有一些地方不把舆论监督当回事,要么阻挠采访,殴打记者,为舆论监督设置障碍;要么轻视舆论监督,不把舆论监督当回事,这些都不是和媒体打交道的正确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舆论监督只会越来越强化,微博的兴起,让人们时时处处都可以上网,用手机把身边违法违纪的人或事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传到互联网上。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大地上,“全员监督”时代已经来临,如果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仍然是原来的“死脑筋”,无视舆论监督,拒绝舆论监督,或者面对舆论监督口出狂言,那么他迟早会被舆论监督得“体无完肤”,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

揭开“跨省毁报”背后的面纱很重要,能够从不和谐音中听到错位的真实,从网民的激烈情绪中把握民意的活力更重要,这是网络时代各级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和应有姿态,在这方面,四川省会理县“悬浮照”的领导们已开了一个好头,但愿更多的领导干部能够体味出其中的真谛!

时事乱炖

媒体称,广州番禺城管分局政委蔡彬及家人拥有21处房产,这些房产价值超过4000万元。其妻子时丽珍也为公职人员,现已退休,名下有房产17套。蔡彬否认有21套房产,称“如果真有那么多,我肯定很高兴”。(今日本报18版)

民意围观的是房产,更是财产公示制度

金戈

民意围观的是房产,更是财产公示制度,因为房产本应该包含在财产公示制度当中。但问题是,现阶段的财产公示制度前景还难容乐观。从1988年提出这项立法动议到现在,已历时20多年。从中办和国办1995年颁布关于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申报收入的内部规定到现在,已经过了17年,从2001年中央纪委和中组部联合制定省部级高官家庭财产报告的党规15条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十一个春秋。

现阶段财产公示制度虽然在新疆阿尔泰、浙江慈溪、江苏绍兴等地展开,但暴露的问题也不少,尤其在房产问题上难以大动作。更需要指出的是,有限的公开多在内部开展,如宁夏银川市采取的方法是在官员所在单位内部公示,通过局域网或公告栏公示,外界只有前往该单位才能看到,公示期只有7天,到期后申报内容存入档案。

整个社会民众对该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从媒体铺天盖地的关注报道,到网民数量庞大的



王恒/图

跟帖讨论,再到学术界的积极建议,都显示出了社会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关注。鉴于当前的反腐形势和公民的知情权需求,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早早接地气,让更多的社会公众能够了解公示的内容,并借鉴国外经验,在实践中扫清制度障碍,早日完善出切实可行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时评

电子信箱的勃然兴起,的确给信息交流、来往通讯、新闻传播等诸多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快捷与变化。好处多多,毋庸赘述矣。

电子信箱和书信尺牍

余云

由此,我想到“八行书”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亲笔手札寥若晨星。至于我的一些亲属来信,不但字丑,错别字也时有出现。我想,电子信箱与手书信札当并行不悖,各有千秋。这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要是“失传”了,真是十分可惜!

我国历代的书信尺牍,有人把它放在随笔、散文、小品等一类,也有人把它作为书法、文学和金石艺术“三结合”的瑰宝来欣赏。著名学者郭预衡著《中国散文史》,特地把它作为“尺牍之文”作为一个章节来论述。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煌煌钜著10册中,除两册日记外,其余全是书信,从1904年至1936年,共1388件,原件影印,那些彩色的笔谱,至今仍光华夺目。在当今的文物拍卖市场上,名人书札也是抢手货,可以这么说,它是一块蕴藏量很大的文化宝库。时下出版的《曾国藩家书》、《茅盾书信集》、《巴金萧珊书信集》、《傅雷家书》,以及《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等等,在这里可

以欣赏到先辈学人的遗墨,还有很多珍贵的文史资料可以参阅。

历代许多先辈的书札,籍籍笔毫以达意,借缣素以述情,非常赋有文采。诸如人们熟知的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等,这都早已进入了文学典籍。我曾读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在广州起义前夕给妻子的绝笔书,壮怀激烈,情挚感人,至今还有些印象。信中说:“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此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此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乎!”这些话说得多深刻,把儿女私情溶入了爱国情怀之中,既是抒情之文,又是宣扬辛亥革命理论的檄文!

话又说回来,我是主张在广泛运用电子信箱的同时,那些手书信函、“八行书”,也要保留,传承下来,让这一份传统文化渊源流长。——我的这些想法是否发思古之幽情,是耶非耶,其是然耶。

非常道

某大学“校友基金会”工作人员抱怨说:“别的大学搞校庆,捐款有几亿元。我们学校到现在还不到2000万元,太少了,领导都非常着急。”

最近武汉各高校的校庆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继10月6日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工业大学60周年校庆后,武汉工程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江汉大学文理学院、武汉商贸学院等高校将接连举办校庆活动。

“我自己平常就挺热心公益,现在回头看看自己太太挺这么大肚子都没人有心让个座,感觉还是有点心寒。”

从25岁起,南京的胡翊便开始坚持献血,13年下来,他已经累计献血3.6万毫升了,其妻子怀孕无人让座。有这么多人关注到胡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胡翊“献血英雄”的身份。